

## 台湾青年选举参与现状研究

■ 党朝胜 杨晶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北京100083)

**【摘要】**近年来,台湾青年选举参与“由冷变热”,不仅对岛内政局产生巨大影响,也给两岸关系带来全新挑战,加强对台湾青年基本政治立场及选举行为的研究,具有重大理论与现实意义。影响台湾青年选举参与的因素很多,既有制度因素,也有政党、教育、经济与国际环境等因素。因此,台湾青年要想在现行体制下通过选举实现“公平正义”根本是个伪命题。实现台湾青年在政治上的“公平正义”,不仅需要改革选制,更应认真落实上海Y20会议提出的“消除贫困和共同发展”“社会公正和权利平等”等倡议,唾弃“民粹”、提升台湾青年的政治经济地位,真正选贤举能。

**【关键词】**台湾青年 政治参与 选举权 被选举权 制度因素

近年来,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热情不断高涨,无论是参与“社运”“学运”等社会运动,还是监督批评政府,抑或直接参与选举,都表现出空前热情。这种新变化不仅对2014年“九合一”选举与2016年“大选”结果造成直接影响,而且深刻影响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的走向和节奏。因此,加强对台湾青年的基本政治立场及选举行为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试图从选举参与的角度切入,对台湾青年参选公职的现状、特点与影响因素作一相对全面深入的研究,以期对未来加强台湾青年的工作提供一些参考。根据岛内主要政党对青年的界定以及岛内20岁才有选举权的规定,本文青年界限为20-40岁。

### 一、岛内青年参选公职的现状与特点

选举权利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从政治发展史看,两者都不是“天赋人权”,而是后天争取的结果。台湾地区亦是如此,并自1991年之后,无论是选举类别还是选举制度等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之前,台湾地区“中央”层级选举为“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增补选,地方层级为省市(“院辖市”)议员、县市长及议员、乡镇市长及民意代表、村里长与村民代表等。1991年“修宪”后实现“国代”与“立委”全面改选;1994年实现省市长直选(台湾省长选举举行一次后即因“冻

来稿日期:2017-02-28

作者简介:党朝胜,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岛内政局、两岸关系;

杨晶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台湾选举、台美关系。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视域中两岸青年价值观比较研究”(课题编号:14BZZ071)、2016年度中国青少年研究会重点课题“当前两岸青少年交流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研究”(课题编号:2016A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省”而终止,1998年只剩台北、高雄两“院辖市”改选);1996年实现“总统直选”。2000年“国代”改选停止;2005年“修宪”废除“国民大会”,相关选举亦废止。“立委”选举在2008年改采取“单一选区两票制”,“立委”数量减半至113席,并由3年一次变为4年一次改选,2012年开始与“总统”选举同步举行。2010年“院辖市”增至5个,包括台北、高雄、新北(原台北县)、台中(原台中市县)、台南(原台南县市),与原来的县市长改选同时举行,与之相应,这些升格县市的乡镇市长及同级民代改选取消。2014年桃园县升格,“院辖市”增至6个,同年底举行“九合一”选举(全台各项选举加起来有9项之多)。最终,岛内选举形成当前4年一次“中央”层级选举,4年一次“九合一”选举,两场选举相隔两年。

### (一)选举权

选举权是民主社会中普通公民政治参与的最重要的平台,是参政权中的首要权力。在岛内,除剥夺公民权者外,只要年满20岁即有投票权。不过,这比全球近90%的国家或地区所规定的18岁即有投票权晚了两年。

其一,有关投票年龄的争议。虽然近年来岛内要求将投票权下调到18周岁的呼声很高,岛内主要政党也多次提议“修宪”,将投票权下降到18周岁,但长期以来并未获主流民意支持。台“青辅会”2004年特别针对18-35岁年轻族群的民调显示,尽管“大选”期间参选人都喊出将选举权年龄下修至18岁,但多数年轻人不以为然,近70%不同意,同意者仅为26%<sup>[1]</sup>。即便在青年参政话题不断升温的形势下,投票权下调至18岁也非多数民意。因很难找到专门针对年轻族群的民调,不妨参考其他年龄段的民调。2014年6月12日台湾指标民调公司民调显示,38.4%赞成“修宪”下调投票权至18岁,52.1%不赞成,即便作出严格限制,支持者仍仅为40.2%,不支持者为48.2%<sup>[2]</sup>。2015年岛内“修宪”话题最热之际,台湾世新大学民调显示,同意18岁有投票权者为44.2%,不同意者为47.1%<sup>[3]</sup>。

其二,有关青年的投票行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台湾青年投票率一向较低,尤其是“首投族”(第一次有投票权的群体)。目前,岛内20岁以上具投票资格的选民共约1850万人,其中20-40岁的青年约650万人。每隔4年“首投族”(20-23岁)约120万-130万。按常理,“首投族”第一次行使选举权,理应有激情,但事实并非如此,以往历次选举中,台湾青年投票率仅为30%左右<sup>①</sup>。为争取这些“沉默的青年”,2012年“大选”时,蔡英文以“台湾NEXT”为口号拉近与青年特别是“首投族”的距离,但当年首次获得投票资格的年轻人,对选举并不热衷,其中17%的“首投族”明确表示“不投票”,最终投票者约为50%,远低于近7成的总投票率,“首投族”投票率偏低似成规律。

历经2013年、2014年“洪仲丘事件”“太阳花学运”后,台湾青年尤其是“首投族”投票激情剧增。2014年底“九合一”选举,青年参与投票的情形发生了巨大变化。据台湾智库民调显示,20-39岁年轻人投票率高达75%-78%,远高于以往同级选举平均60%的投票率;其中80后选民选票占总得票的35%,达520万票<sup>②</sup>。“九合一”选举成为“台湾年轻世代参与程度、自主动员程度最高的一场选举”。2016年“大选”,台湾智库公布的选民投票行为民调结果显示,“大选”总投票率虽仅为66.27%,但20-29岁年轻人有高达74.5%的投票率,“首投族”参与投票的比例更高,且其中约7成票投给了蔡英文<sup>[4]</sup>。

### (二)被选举权

与全球多数国家或地区不同,台湾地区对青年参选公职的规定相对严格。

<sup>①</sup> 参见信强:《首投族的投票倾向:以台湾“九合一”选举为例》,载《2015年青年发展融合论文集》,第178页。

<sup>②</sup> 参见任冬梅:《论网络新媒体对台湾青年政治倾向和行为的影响》,载《2015年青年发展融合论文集》,第496页。

一是年龄门槛。按台湾地区现行相关规定,民众 23 岁才有参选权,可参选村里长、乡镇市区代表、直辖市议员、县市议员、“立法委员”,参选“总统”需满 40 岁(青年被排除在外,故下文不再讨论此问题)、“院辖市长”35 岁、县市长 30 岁、乡镇市区长 26 岁<sup>[5]</sup>。

二是“保证金”门槛。台湾地区参选公职都需要递交较高数额的“保证金”。如参选“立委”“院辖市议员”、县市长需交 20 万元(新台币,下同)、“院辖市长”200 万,就连“院辖市”里长保证金也高达 5 万<sup>[6]</sup>。

三是提名门槛。“立委”部分,侨选及不分区“立委”候选人需由政党提名,有资格提名的政党需在本次“立委”选举中获得 5% 以上的政党票。地方“公职人员”选举中虽都无政党提名规定,但“院辖”市长及议员、县市长有政党推荐者更易当选。至于县市议员、乡镇市长、村里长、乡镇市民意代表,过去长期都是由政党推荐者更易当选,近 20 年来以无党籍身份当选者更多,他们主要靠地方派系或家族势力支援当选。

四是竞选经费门槛。台湾地区对竞选经费支出有严格限制,但实际支出往往高出很多。台湾青年在实际能参与的各级公职选举中,“院辖市长”、县市长、乡镇市长、原住民区长、村里长选举竞选经费上限,是以各选举区人口总数的 70% 乘以每票基本金额 20 元,再加上一个固定金额,两者合计而成。其中,固定金额部分规定:“直辖市议员”1 000 万、县市议员 600 万、乡镇市民代表、原住民区民代表 200 万、“院辖市长”5 000 万、县市长 3 000 万、乡镇市长、原住民区长 600 万、村里长 20 万<sup>[7]</sup>。按此计算,竞选台北市长的经费上限约 8 800 万,但实际花出远不止于此。1998 年底在台北市市长选举的最后关头,一向哭穷的民进党举办了一场“抢救陈水扁”造势晚会,光便当(盒饭)费支出就超过 1 000 万,至于广告费、人员费,甚至还有不能登上台面的拉拢派系山头的所需费用更无法计算。高雄市,谢长廷在 2002 年成功连任高雄市长后申报的竞选经费虽未超出 2 500 万的上限,但“后援会”公开的总收支高达 6 800 万。区域“立委”竞选方面,经费上限以各选区之应选名额除以选区人口总数的 70%,乘以基本金额每票 30 元所得数额,再加上固定金额 1 000 万<sup>[8]</sup>,如此下来,每位“立委”竞选花费只需数千万而已,但事实上每位当选者的花费动辄上亿,数倍于规定数额。总之,选举是有钱人的游戏,台湾俚语更称:“选举无师傅,用钱买就有。”因此,台湾青年要想参选进而当选,仅经济支出就是一项难以承受的负担。

五是实际当选情况。“院辖市长”选举迄今尚无 40 岁以下青年当选纪录。其他公职选举部分,在青年参政热情高涨、各政党力打“青年牌”的情况下,2014 年“九合一”选举出现一股青年“参选热”并创下许多纪录。其中,台北市有 10 位青年当选,占台北市议会总席次 63 席的 16%,桃园市 26 岁的王浩宁高票当选桃园升格为市后的第一届市议员,是“六都”最年轻的议员;县市长选举历来不乏青年当选纪录,2014 年又有民进党提名的林智坚在 39 岁当选新竹市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村里长部分,青年当选额都较以往增加,其中,25 岁的薛呈懿以无党籍身份参选当选宜兰县议员,成为全台最年轻的县议员,树党提名的 29 岁陈纪衡当选镇长,成为全台最年轻的镇长。同时,小型政党如绿党、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靠青年参选人一举打破零当选记录,更被舆论称作“略微撬开地方长期以蓝绿或派系分野的政治版图”。区域“立委”选举虽不缺青年当选纪录,但一直数量少、比例低,2016 年一次却有 5 人当选,占了 73 席区域“立委”的 7%,最年轻者仅 28 岁<sup>①</sup>。

### (三)当前台湾青年参与选举的主要特征

一是台湾青年对选举参与正“由冷变热”,但青年参选公职比例仍偏低。过去,台湾青年在行使投票权时,即使对大环境非常不满,但经常会因顾虑投票成本过高而放弃投票权,其中以

<sup>①</sup> 根据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数据计算所得。

“首投族”最突出,过去投票率长期维持在30%左右。有调查显示,“首投族”不投票理由排第一位的是“对整体政治环境失望”(58.4%),其余依次是“有事不去”(50.9%)、“时间安排不当”(50.5%)、“要花交通费”(39%)、“没有交通工具”(32.1%)、“没有人陪伴”(20.3%)等<sup>[9]</sup>。现在,受各党激励以及自身意识改变,青年尤其是“首投族”投票热情高涨,甚至远高于平均投票率。在参选过程中,青年参选及当选总比例较过去也有明显提高。前面已有数据,在此不再赘述。不过,这与岛内青年占总体选举人数的比例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二是青年参选尤其是当选者大多有深厚的政经背景,多是“官二代”“富二代”“助理幕僚帮”,或“社运”“学运”骨干。民进党“立委”陈明文能在26岁时当选嘉义县议会副议长,成为当时全台最年轻的副议长,背后是其父亲陈福三为嘉义货运界名人,是嘉义县“林派”的头面人物。前桃园县长吴志扬35岁当选“立委”、40岁当选县长与其祖父、父亲都曾任桃园县长以及父亲吴伯雄是国民党前主席不无关系。陈水扁之子陈致中2010年能以无党籍身份当选高雄市民议员,陈水扁当然是最主要的因素。民进党当前活跃的中生代如赖清德、林佳龙、蔡其昌、林佑昌、萧美琴等都曾任民进党大佬助理或幕僚。2014年“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提名的青年,要么曾任“立委”助理;要么在行政部门或党内智库经营。尤其在台北市议员提名的六七位青年都有明显的“官二代”“助理幕僚帮”的印迹。如民进党大佬谢长廷之子谢维洲、民进党前主席黄信介之侄黄向群等。2016年区域“立委”选举,“时代力量”当选的3人中有2人年龄在40岁以下,另一位42岁,这些人都靠“洪仲丘事件”或“太阳花学运”打响名头<sup>①</sup>。

三是台湾青年参政有明显的政党差异。民进党乃至整个泛绿阵营较国民党及整个泛蓝阵营更能吸引青年。虽然两党都强调重视青年,希望能提前培养接班梯队,但从当前情况看,绿营青年有更高的社会知名度和选民认同度,当选几率也更高。反观蓝营国民党,所推青年往往会攻击为“官二代”“富二代”甚至“权贵子弟”,进而成为竞选负担。此外,绿营青年很多都有浓厚的“反中”情结,尤其是“时代力量”已取代“台联党”成为“台独”势力的新代表。

## 二、台湾青年选举参与发生变化的影响因素

(一)制度因素:复杂的选举制度对青年参政热情、参选方向产生了复杂影响

一是准入高门槛将许多青年直接排除在选举外。在年龄设计方面,按台相关规定,台湾青年满16岁就可工作并应尽缴税义务,年满18岁在刑法上必须负完全的刑事责任、必须服兵役,但20岁才有投票权,23岁才有被选举权,被岛内舆论尤其是主张公民权全面下降至18岁者批评为权利义务不对等。在“保证金”设计方面,因每项选举参选者都须缴纳巨额“保证金”,对那些上有老下有小自身需奋斗的青年而言,无疑是笔巨额开支。在竞选经费方面,岛内现行制度虽未规定选举必需花钱,但对竞选经费上限、选举经费补助等系列规定,其实是对庞大竞选经费支出的承认。当然,庞大的选举支出远非一般寒门子弟能承担。2014年参选台北市长失利的冯光远便称,这次参选经验中,他最有意见的是保证金太高,让他一次失血200万,他称“中选会”以金钱限制公民参选,只会阻碍人民投入政治,不利于青年参政。“青年占领政治”发起人冼义哲表示,要继续推动“宪法”第130条修正案,让参政权全面下修至18岁,打造权责相符的体制,并推动公费选举<sup>[10]</sup>。

二是“立委”选制变革让普通青年更难出头。按台现行规定,区域“立委”选举2008年改采取“单一选区两票制”,每个区域“立委”选举如同地方首长选举,但普通青年限于知名度、经费、人脉关系等因素制约,当选难度进一步提高。并且,这种“赢者全拿”的方案也让多元声音难以

<sup>①</sup> 根据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数据计算所得。

呈现。相反,青年们在“院辖市”、县市长议员等层级较低的民意代表选举中,只要排名相对靠前便可挤进应选名额顺利当选,因此台湾青年更愿投入这类选举。

三是各党现行提名机制增加了普通青年参选难度。虽然独立参选人越来越多,但由政党推荐的参选人无疑更易当选。然而,各党推荐参选人一般都要经过提名委员会,这个机构所定初选规则看似公平,实则并不利于新人出头,即使是青年间的竞争,也相对有利于“官二代”“富二代”或“助理幕僚帮”。因为新人的知名度肯定不如“老人”,同样是青年,普通青年的社会资源肯定不如“有背景”者。这不仅淹没了很多真正有行政、问政能力的青年,也造成岛内政客只会选举不会治理,岛内政治日益“民粹化”。此外,各党还有“征召”提名机制(不经初选便指定参选人),让提名过程有更多“黑箱”空间,进而影响了普通青年的参与机会。

## (二)政党因素:政党体质差异让民进党对青年更具吸引力

民进党前身是“党外”势力。“党外”势力反“体制”、反国民党威权统治的做法在普通成年人中没有太大市场,但却契合了青年不愿墨守成规的性格。因此,民进党成立前便与青年互动频繁。民进党成立后,其“台独”主张不被广大民众接受,而政治顾忌少的青年却成为其组织发展、理念宣传的重要对象。同时,民进党内发展机会比国民党多也让有意从政的青年更愿投靠。

最重要的还是民进党有一系列拉拢和培养青年的措施。民进党政治人物无论担任行政首长还是民意代表,都会以任命政务官、挑选助理的方式培养提拔大批年轻人,反过来,年轻人通过担任助理或幕僚学习、实践的机会也很多。台现任“行政院长”林全当年就是陈水扁台北市府团队的要员。当前民进党新生代也多从助理、幕僚做起,又被称为“幕僚世代”。民进党政客还喜欢通过举办训练营等方式网罗青年。陈水扁有“凯达格兰学校青年营”,谢长廷有“新文化研习营”,林义雄有“慈林青年营”等<sup>①</sup>。至于民进党内组织最严密的“新潮流系”,更有一整套培养青年的方案。青年要进入“新潮流”系,须先经过严密观察、考核及审查程序,一旦准入,“新潮流”会把派系发展和个人生涯规划相结合,参选、入“阁”、下放地方、担任“部会”机要等的机会成本都精确计算,甚至赴海外留学都可由派系出钱。有人称,“新潮流”提供了一个政治工作者所梦寐以求“从出生到坟墓”的政治训练,以及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当然,民进党的青年培养还可通过各级党部招募党工、政客竞选团队挑选志工等方式完成。

此外,长期与民进党关系密切的各类社运团体也是民进党发掘人才的重要场所。民进党成立之初就有很多人来自工运、学运、社运及文化运动团体。后来,民进党各派系也都有许多外围社团。“新潮流”有“环保联盟”“台湾教授协会”“台湾劳工阵线”“外省人台湾独立促进会”“台湾人权促进会”“开拓基金会”等;“正义连线”有“福尔摩沙基金会”“医界联盟”“首都基金会”等;“福利国连线”有“新文化基金会”等;“台独联盟”有“世界台湾人联谊会”等;“主流联盟”有“公民投票委员会”等。长期以来,各类社运团体为民进党输送了大量的后备人才,尤其是历次大规模运动的青年骨干更被民进党主动吸收。不过,现在情况有所改变,“洪仲丘事件”“太阳花学运”的骨干自组“时代力量”,与民进党形成竞争局面。

## (三)教育因素:长期的学校教育让岛内青年越来越关心并投入政治

一是“公民意识”的灌输。学校教育是公民教育的主要途径,现在岛内小学三年级的社会科中便有“公民意识”内容。在一般国家或地区,公民意识的主要内容包括公民的人格意识、自由意识、责任意识,以及对国家社会的参与意识、监督意识、责任意识,法律(规则)意识等。台湾的公民课却重视向学生灌输公民对政府的抵抗权,大多数台湾青年认同“争取是天赋的权利”,接受天赋人权、独立、自主、敢于追求权益。可以说,学校教育让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对政

<sup>①</sup> 参见全国台湾研究会:《民进党新时代人物群像》,第7页。

府的信任感下降,怀疑度上升,并更热衷于“社运”“学运”,稍有不满意,就会走上街头。当然,民进党与社运团体的关系长期密切,国民党无论在朝或下野,总会被抹黑成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对立面,成为“被监督”、行使“公民抵抗权”的对象。

二是“台独史观”的灌输。李登辉自站稳脚跟后便开始鼓吹“台湾主体性”、煽动“台独”分裂意识,并在教材改革中加以落实。自1997年启用《认识台湾》教材开始,岛内各级学校(含中小学、大学)教材日趋“本土化”。陈水扁时期的教材充斥着“台独史观”“皇民化史观”,赤裸裸地向学生灌输“两国论”“一边一国论”,声称“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存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台湾地位未定论”、国民党是“外来政权”等论调,并不断美化粉饰日本侵略与殖民统治。马英九任内长期忽视教材调整,直到2014年才推出所谓“微调课纲”,而2016年蔡英文政权一上台便被废除,陈水扁时期的教材被重新起用。

长期的“台独”教育,让台湾青年的中国认同越来越淡,甚至对“中华民国”的“中国意涵”认同也越来越淡,而以“台湾”定义“中华民国”的倾向更加明显。2013年台湾TVBS民调中心的“身份认同与年龄关系交叉表”(见下表)显示,20-29岁群体的“台湾人”认同比例较其他年龄层更高。“新台湾国策智库”在“习马会”后公布的民调显示,98%的年轻世代(20-29岁)认同自己是“台湾人”,仅2%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认同“台湾未来应独立成一个国家”的比例高达81.9%<sup>[11]</sup>。越年轻的群体越觉得大陆“不亲近”,20-29岁年轻族群较其他年龄层对大陆的感觉更疏远与不信任。台湾“中研院社会所”调查资料显示,2011年青年世代(20-34岁)“台独”支持率为43%,2012年为46%,2013年为49%,2014年增至56%<sup>[12]</sup>。

岛内统“独”民意的这种变化,不仅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产生严重干扰,而且对岛内选举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绿营所推候选人更易争取青年选票,而一些青年在参选过程中,尤其是新成立的“时代力量”参选人,更是在选举过程中大放“独”论,进一步“独”化岛内舆论。

身份认同二选一与年龄交叉表<sup>[13]</sup>

身份认同	年龄与认同度					
	全体 (100%)	20-29岁 (19%)	30-39岁 (21%)	40-49岁 (20%)	50-59岁 (19%)	60岁以上 (21%)
台湾人认同	78%	89%	83%	75%	76%	69%
中国人认同	13%	11%	11%	16%	14%	14%
不知道/拒答	9%	0%	6%	9%	10%	17%

注:本数据经过4舍5入处理。

#### (四)经济因素:长期的经济困境对台湾青年从政有激化作用

青年人大多刚走入社会,有些正准备走入社会,人生挑战才刚开始。他们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孝敬父母、抚养子女,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普通青年要想当选无异难于登天。然而,台湾长期的经济困境,让青年较其他年龄层更直接受到冲击,长期面临起薪低、薪资停滞、低薪化的困境。2014年统计数据显示,台湾30岁以下青年包揽失业率前3名,薪资更是持续走低,9成月薪不足4万<sup>[14]</sup>。2015年,台湾第三季GDP呈1.1%负增长创6年新低<sup>[15]</sup>,青年失业率超过13%,大学生起薪点15年未变,“毕业即失业”已成常态<sup>[16]</sup>。台湾经济长期低迷,与大陆经济形势形成鲜明对比。在民进党等政治势力的操纵下,台湾青年甚至将不满指向国民党当局与大陆,“反马反中”思潮泛滥,并左右了他们的投票选向。国民党在2014年“九合一”选举和2016年“大选”接连惨败,与经济形势不佳有很大关系。当然,蔡英文执政后岛内经济持续恶化,也让蔡本人及其行政团队支持率不断下滑,如果岛内经济形势长期低迷,两年后的“九合一”选

举、4 年后的“大选”民进党能否保住现有绝对优势,要打上一个大问号。

#### (五) 国际因素:既有国际思潮的渗透也有国际势力的插手

当前国际社会流行的“左翼社会思潮”已渗透到岛内,并与岛内“民粹”思潮结合,成为“激进左翼社会思潮”。这股思潮主张“公平正义”与“分配公平”,反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甚至反商。因而只要有人高喊“公平正义”,不分蓝绿贫富都会积极响应,就连在两岸关系中获利较多的人士、待遇相对稳定的“军公教”阶层,也被描述为“特权阶层”“特殊利益团体”,被舆论口诛笔伐。同时,受“颜色革命”、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影响,台湾青年认为他们组织或者参加的社会运动是以和平、理性、创新、非暴力为表达诉求的手段。针对舆论新变化,民进党乃至整个绿营选举时往往以“庶民对权贵”、反对“两岸特殊利益集团”打击国民党。当然,民进党的“官二代”“富二代”与“助理秘书帮”,如陈水扁之子、谢长廷之子等参选则被美化为“传承”“担当”等。同时,国际反华势力也不忘染指台湾青年。2016 年 4 月,第 11 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会议就是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在达赖喇嘛的印度寓所举办的一个汇集各股“独派领袖”的政治聚会,台湾青年也在被邀之列。此外,岛内青年从政热还与新媒体广泛应用有关。借助新媒体,政治参与的表现与传播形式更快捷、更创新、更吸睛。新媒体的发展降低了青年政治参与的门槛。

青年问题非常重要。台湾青年与大陆青年一起肩负着中华民族的未来,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要更多关注两岸青年成长,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舞台,让他们多交流多交心,成为共同打拼的好朋友、好伙伴。然而,我们也应正视岛内青年思想行为变化的最新动向,及其对岛内政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以及国家统一与民族融合进程产生的深刻影响。要充分认识到青年思想与行为动向的共性,如可塑性强,稳定性弱,在遭遇困境或倍感迷茫时往往比其他年龄阶层的反应更迅捷强烈,甚至做出不理性的举动,要以“可以被原谅、需要被包容”的心态来看待台湾青年的各种变化。当然,我们也应让各方明白,台湾青年要想在现行体制下通过选举实现“公平正义”是个伪命题。只有更多地从经济方面着手,落实 2016 年 7 月上海 Y20 会议(20 国集团青年会议)“消除贫困和共同发展”主题,才可能消除青年参政的真正阻碍;只有唾弃“民粹”,认真落实上海 Y20 会议提出的“社会公正和权利平等”倡议,才能实现选贤举能,让台湾社会保护安定繁荣。

#### [ 参 考 文 献 ]

- [1]《台政治人物欲降低选举权年龄 近七成年轻人反对》,http://news.sina.com.cn/c/2004-08-12/11373381899s.shtml
- [2]台湾指标民调公司:《台湾民心动态调查、政经社会焦点》,http://www.tisr.com.tw/wp-content/uploads/2012/06/TISR\_TMBS\_201406\_11.pdf
- [3]《台世新大学民调:多数赞成“阁揆”同意权》,http://www.taihainet.com/news/twnews/twdnsz/2015-05-22/1422483.html
- [4]《74.5% 年轻人返乡补刀台湾智库:周子瑜反映国族意识》,http://ettoday.net/news/20160121/635033.htm
- [5][6]陈方隅:《扫除青年参政障碍提升政治权利平等》,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16513
- [7][8]《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20010
- [9]苏颂兴:《民主化进程中台湾青年选举行为检视》,载《青年学报》,2016 年第 2 期。
- [10]陈慧萍:《“青年占领政治”拿下 5 席民代》,载《自由时报》,2014 年 12 月 13 日。
- [11]林泉忠:《何谓“天然独”? 台港新一代“去中国”思维的特征(上)——台湾的语境》,载《明报》,2015 年 12 月 3 日。
- [12]张铁志:《小清新与台湾大选》,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5825?full=y
- [13]王鸿志:《台湾青年世代认同问题初探——基于国家认同的社会分化及其演变》,载《台湾研究》,2016 年第 3 期。
- [14]《台湾 30 岁以下包办失业率最高前三名,九成月薪不到 4 万》,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2197
- [15]《台湾第三季 GDP 保一不成还变负一,创六年新低》,http://finance.technews.tw/2015/10/30/tw-gdp-q3/
- [16]《台湾 8 月份青年失业率逾 13% 每 7 个人就有 1 个人失业》,http://news.xmnn.cn/a/thxw/201509/t20150927\_4657223.htm

(责任编辑:王俊华)